

新世纪塔尔图学派的研究动态

姚婷婷

内容提要 近几年，符号学研究延伸到文学、影视、社会等多个领域，符号学的疆界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作为符号学理论的重要学派，塔尔图学派所取得的成果无疑是众多符号学研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文化符号学以及生态符号学在塔尔图得到越来越多的深层次和创新性的诠释，焕发出全新的魅力。学派对符号域理论以及文本和语境间动态联系的研究，更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意义衍生机制。

关键词 塔尔图学派 符号学 符号域 文本 环境界

2017年6月，第十三届世界符号学大会在立陶宛第二大城市考纳斯举行，本次大会的议题是“跨越-学科间-多学科-转换”（“cross-inter-multi-trans”），这意味着世界符号学研究正朝向不同学科的渗透以及跨越边界寻求多学科合作的转向。20世纪80年代之前，符号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符号学系统和逻辑的结构主义。20世纪80年代之后，塔尔图学者们将“前语言符号”纳入了符号学的研究范畴，由此，在研究意义产生的过程中，塔尔图的符号学有了更为拓展性和包容性的概念。随着符号学的门槛被不断降低至生命的起源，生命符号学和生态符号学在全世界得到蓬勃发展，而塔尔图的新锐学者们在这一崭新领域表现得尤为积极且成果颇丰。1992年，塔尔图大学成立了符号学系，并设立洛特曼、乌克斯库尔^①和西比奥克研究中心，“新塔尔图学派”就此正名，这也标志着塔尔图符号学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世纪以来，深受形式主义影响的塔尔图学派新一代学者以《符号系统研究》（*Sign Systems Studies*）杂志为学术阵地，一方面继续对洛特曼、乌斯宾斯基、托多洛夫等大家的经典理论进行诠释和重新解读，另一方面则着力于用符号学方法探索符号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的联系。

塔尔图的整个学术氛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年轻的学者们同样倚重乌克斯库

^① 雅克布·乌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 1896—1944），德国生物学家、符号学家，是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代表人物。他提出“环境界”（Umwelt-theory）理论，研究自然界中生命的主观知觉与自然界的联系，包括生命体怎样生成意义以及相应的行为。

尔和西比奥克的生物学观点，将所有生命系统的符号过程都纳入研究范围，又与文化符号学和广义符号学联系密切，彼此相容，使新塔尔图学派的研究内容兼容并包又独树一帜。尽管随着第三次移民浪潮和代表人物洛特曼的辞世，蓬勃了四十多年的塔尔图学派略见颓势，但塔尔图学派的学者们仍然孜孜不倦，在符号学体系中探索着符号与语言和文学实践的动态关系。目前中国符号学界对塔尔图学派的研究还停留在对洛特曼、伊万诺夫和乌斯宾斯基等人的关注上，对该学派的最新发展动态和译介关注甚少，尤其是在生物符号学和符号翻译学领域。笔者借由对塔尔图学派发展最新动态的研究，通过考察其对文化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尝试搭建起中国符号学界与塔尔图学派交流对话的桥梁。

承袭：对文化符号学的诠释

在继承洛特曼、乌斯宾斯基、托多洛夫等人学术遗产的同时，塔尔图派学者们用全新的视角去解读本派大师的学术思想精髓，探究每一个可能被忽略的理论空白。许多学者乐于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去回顾经典作品，用史学策略去搜寻塔尔图学派研究议题中的空白，而一些与历史或历史著作相关的议题在对比研究中被诠释得更加明晰，“从某种意义上‘新’的老观点又催生了新的讨论并突出了原先被忽略的焦点”^①。

在《符号学的史前史与历史纲要》（“The Outlines of the Prehistory and History of Semiotics”）一文中，塔尔图学派创始人之一伊万诺夫教授曾指出了符号域研究的重要意义：“符号学的任务是描述符号域……符号学在未来的最终建立，少不了积极致力于这个科学领域，以及整个科学链条中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②“符号域”的概念与洛特曼的“第二符号模拟系统”（secondary semiotic systems）、“文化文本”等一系列概念紧密相关。在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中，意义的生成，抑或是理解为文化的整体与组成文化的各部分协同产生出新文本的能力，被认为是文化符号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塔尔图派新一代学者们把符号域看作分析意义生成动态过程的综合方法论，在时间的维度中深入探讨符号域以及符号域中意义的自我传播。他们认为，描述符号系统中时间的普遍特点以丰富内部类型学的方法可以被纳入所有与文化相关的学科，尤

① Taras Boko, “Describing the Past: Tartu-Moscow School Ideas on History, Historiography, and the Historian’s Craft”, in *Sigh Systems Studies*, 43 (2015), p.269.

② Vyachelav V. Ivanov, *Izbrannyye trydy po semiotike I istorij kul'tury*, Moskva: Shkola “Yazyki russkoj kul'tury”, vol.1, 1998, p.72.

其是文学文本分析，其目的是为了找到一种可以描写文化的元语言。元语言可以整合文学语言的不同层面，促成文学语言的自我传播和自我理解，使文学的不同部分之间进行对话交际。在元语言的描述下，原来离散的语言和连续的语言间的不可译性被自动打破，文学内部与外部的实时沟通达成。比如，文学文本对语境发挥了言语功能，作者的创作态度对文本要素发挥了结构功能，而同一个文本又对文学外部发挥了文学功能，使沟通得以不间断地进行。新塔尔图学派着力于描述符号域理念的根源和不同历史阶段中大相径庭的概念特征，认为符号域的解释力或许能很好地让我们理解特尼亚诺夫关于文学演进过程的分层法和雅各布森的交际理论，甚至是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

除了对符号域的历时研究，新塔尔图学派对符号域内部特征也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总结。洛特曼的早期研究偏向于结构主义方法，而符号域的提出则表明了他对该理念的理解进入一个动态过程，他强调符号媒介和异质性共同形成了符号域。新塔尔图学派的奥利弗·拉斯（Oliver Laas）在解读洛特曼的符号域概念时补充认为符号域的内在动态过程由其促成原则驱使，并对洛特曼的符号域理念进行了进一步概括：（1）符号域表明某种统一程度；（2）符号域是作为两种语言翻译机制的界限；（3）外部与内部空间的二元对立；（4）符号空间具有异质性；（5）符号域内部结构不对称；（6）子系统组合成具有明显差异的中心和离散的外围结构；（7）符号域发展出一种元语言来描述自身。^① 符号域内外部间的交流以及意义的自我传播则需要“对话”的介入。毫无疑问，符号域概念是建立在洛特曼开创的方法论原则之一——“对话主义”原则之上的。相较于许多学者在两大对话理论中各自站队，新塔尔图学派则更为详尽地比较了洛特曼的对话理论与“对话”大师巴赫金的理论渊源并找出共通之处，他们更敏锐地指出两大理论系统中“双重理解方式同时进行”的重要性，“理解”一方面创造相异，比如词和对立词，另一方面又在词及对这个词的解释之间寻求相似。对话情景总会先于对话而被理解，它与对话的需求一起都先于真正的对话甚至语言而存在。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用符号域的方法去研究符号域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悖论，却恰如其分地表明了研究对象与描述语言，即符号域和元解释之间的对话性特征。

新塔尔图学派对于对话的参与方和对话发生时的信息交流又做了更为宽泛的历史对比研究。他们提出对话的参与者不一定非得是实实在在的人，因为文本可以充当交流活动中个体的功能，对话不仅发生在人与人的语言交流中，还可以是一种人、文

^① See Oliver Laas, “Dialogue in Peirce, Lotman, and Bakhtin: A Comparative Study”, in *Sign Systems Studies*, 44 (2016), pp.479-480.

本、符号以及符号域中其他潜在实体之间的动态交流。然而对话的先决条件是，信息的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必须有知识面的重合。一方不会完全知道另一方所有的信息，正如双方无法掌握对方在对话行为发生之前的动向。部分未知信息虽然不甚完美却不具有竞争性，这些信息进行交流才得以产生对话。洛特曼的对话建立在信息论的基础上，目的是交换或者创造新信息，因此它既不是零和的也不体现信息之间严酷的竞争性，这与巴赫金的对话在某种程度上是类似的。^①

新塔尔图学派不仅没有抛弃塔尔图学派的理论传统，还坚定地认为符号学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基本问题需要通过对经典的重读才能找到线索，比如帕特里克·西里亚特（Patrick Seriot）便试图通过对比罗兰·巴尔特和洛特曼的理论来厘清究竟什么是符号学、什么是结构主义。他认为洛特曼和巴尔特生活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的差异造成他们二人的符号学理论异大于同，前者的研究对象是文化而后者的研究目标是意识形态。虽然他们都关注符号的解释，但巴尔特倾向于研究“解构”、“批判”和“小资产阶级”，而洛特曼正好相反，他着力于“重构”和“保护高雅文化”。洛特曼认为文化是被储存的集体记忆，巴尔特则认为意识形态是错误的意识，应当被揭去遮盖布，甚至被摧毁。^②

新塔尔图派显然是幸运的，他们尽可以从洛特曼、巴赫金甚至是巴尔特等大家那里汲取理论营养来探寻文化符号学的历史性并论证其学理性。他们从开拓者们那里继承优秀的理论传统，并创造性地把这些传统打造成了探索新世界的利器。符号域理论在新塔尔图学派诠释下被挖掘出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与乌克斯库尔的“环境界”理论形成呼应，为我们探讨生态符号学提供了切入点。

推进：文本与生态环境的互动

符号学为我们所提供的方法论指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尤其是汇聚于塔尔图的一部分生物学家和语言学家通力合作，将对符号系统的描述推进到生命的过程，在对自然生态与人类语言间动态关系的探索中，勾勒出了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的大致框架。塔尔图学派生态符号学的发展得益于乌克斯库尔，相比洛特曼仅仅是反对苏联官方语言学理论，作为生态符号学代表人物的乌克斯库尔对达尔文主义的公开反对更像是来自“乡下地方的歪理邪说”。事实上乌克斯库尔并没有援引过索绪尔或皮

① See Oliver Laas, “Dialogue in Peirce, Lotman, and Bakhtin: A Comparative Study”, pp.482-483.

② See Patrick Seriot, “Barthes and Lotman: Ideology vs Culture”, in *Sign Systems Studies*, 44 (2016), pp.402-414.

尔斯的符号学术语，或者说他根本不懂索绪尔和皮尔斯，他和洛特曼似乎都未遵循任何符号学经典，但是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是深刻的。他们分别构建的符号学系统共同支撑起了当今塔尔图生态符号学研究的框架。

尽管洛特曼和乌克斯库尔在理论构建阶段使用了各自的术语“符号域”和“环境界”来描述模塑世界的内部与外部或思维、文化和文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但塔尔图学派的新兴学者们普遍认为二者本质上如出一辙。就像乌克斯库尔在《理论生物学》中强调“每一个设计都源于其他的设计”，而这个已知的所谓模塑世界包括了生命体的感知和行为以及生命体的内在世界和主体世界之间的关系，这无疑与洛特曼理论体系中符号域的理念异曲同工。生命体对应了文本，“环境界”则对应了语境，“符号域”覆盖了所有的生命体，符号空间先在于符号域中单独文本和文本间的相互关系。生命体和环境界之间的联系可以被看作是文本与语境的关系，而文本除了结构和自动性，还拥有内部动力机制。“文本”不仅是文化符号学中的重要结构因素，也是生态语言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理念。塔尔图的学者们认为，在早期的理论研究中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看待语言在音韵学上的变化或语法上的变形是合乎时宜的，然而想要从话语分析层面公正地看待周遭环境中交流活动的复杂性则显得太过狭隘了。他们把与自然界有机体相关的科学应用于语言和生态环境互动的研究中，系统地探究“生态语言学”的原委——既定语言与它所在的环境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实践性地进行城市语言研究。

新塔尔图学派在论述某个独特符号系统所包含的符号类型时，十分重视实例研究，尤其在拓展相关概念的内部类型学时，他们经常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科学调研以研究不同语言系统的内部特征和言语功能，并最终论证文学实践在一个特定符号学系统中无可比拟的作用。在分析“城市”（urban）或“风景”（landscape）的概念化过程时，塔尔图学者们经常会沿用“文本”这一概念。赫斯-路蒂斯（Ernest W.B. Hess-Lüttich）深入调查了城市中不同群体的言语行为，特别是由多重文化组成的群体，其中包括长期居民、新进居民、移民以及外族人，他把语料库建立在这些不同族群人的言语交流过程中和交流行为发生的关系网上，通过从符号学角度去分析“空间”“动机”和“兴趣”等因素在群体形成中的作用，以及“规范”“知识”“群体成员的言语态度”等，试图描述典型的“群体交流形式”“话语模式”和“辩证方式”。^① 迪特·雷姆（Tiit Remm）则指出直接抒写或阅读一个城市的模式不同于以往塔尔图学派

^① See Ernest W.B. Hess-Lüttich, “Urban Discourse—city Space, City Language, City Planning: Eco-semiotic Approaches to the Discourse Analysis of Urban Renewal”, in *Sign Systems Studies*, 44 (2016), p.18.

中用文化符号学视角看待的城市语言研究，城市语言可以被看作某种文本系统，它承担了这种文化中文本的功能；抒写与阅读，比如城市语言的表达力，目的是在一个文本化的语境中拥有生成无限意义的可能，特别是在文学领域。^①

而文学的显著地位，文学作为城市乃至人类环境界的基本特征，这一观点得到了塔尔图学者们的普遍认可。帕特莱勒（Pierre-Louis Patoine）认为文学文化，基于文本的发展趋势和文本的保存，能参与到一个群体的形成和发展中去，它可与文学赖以生存的空间和时间联结。文学实践是群体中的人们对生活进行分享、领悟和感知的最基本认知活动。帕特莱勒给予文学无与伦比的地位，在他看来文学文本创造了我们居住的世界，当文学文本在一个群体中被分享时，它就成为环境界最重要的产物，也帮助这个群体形成对环境界的共同理解。^② 因此，那些被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有助于重新定义我们的“语言”、“文化密码”（cultural code）、“生活习性”（habits）、“意义的可能性”（possibilities of meaning）以及帮助我们对与自身紧密联系的文化和所生存的地域进行再解读。^③

总而言之，文学文本决定了一个群体语言的命运，而语言是作为生命符号的个体栖息地的结构因子。新塔尔学派通过对文本和生态环境之间互动的调研更加肯定了语言、文本、文学、文化对于一个生命体符号系统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融合：符号学和翻译学的联姻

塔尔图学派从生物学和生态学中提炼出有关意义形成的丰富理念，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自觉地运用于符号学理论的实践和其他的文化理论中，尤其是生态符号学的发展为符号学和翻译学在理论上的联结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在文本分析过程中，许多学者都注意到符号结构特征和语境、语境性的概念辅车相依。他们认为语境存在于文本或符号的周遭，语境赋予文本的形式和主体以符号学的意义，并持续对它产生影响。当在一个特定语境中生成一个新的文本，描述该文本的元语言概念决定了这个文本的形式和意义，此外，元语言与语境之间罅隙的存在使得该文本的意义生成机制得以运转。而翻译活动正是元语言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从生态符号学角度来

① Tiit Remm, “Textualities of the City—From the Legibility of Urban Space Towards Social and Natural Others in Planning”, in *Sign Systems Studies*, 44 (2016), p. 39.

② Pierre-Louis Patoine, “Literature as a Defining Trait of the Human Umwelt: From and Beyond Heidegger”, in *Sign Systems Studies*, 44 (2016), pp.156-157.

③ Pierre-Louis Patoine, “Literature as a Defining Trait of the Human Umwelt: From and Beyond Heidegger”, p.159.

看，作为意义生成过程的翻译（interpretation）和作为某种释意的翻译（translation）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别，每一种意指过程几乎都发生翻译行为，翻译总是在释义。与此同时，生成错误的解释或者犯错也可被看成是翻译，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过程所提供的信息转换或某种“同构体”之间的转换来描述翻译过程或对翻译进行评价，比如好的翻译或坏的翻译。

符号学翻译观是新塔尔图学派理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亮点，尤其是符号学界已经认识到二者的结合对于符号学乃至翻译学的发展都意义深远，更是早在2007年符号学最权威杂志《符号学》（*Semiotica*）上就介绍了其理论研究的可行性。塔尔图派学者们遵循这个轨迹做了更为体系化的研究，他们强调可以把翻译这个概念精确地应用到各种各样的非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例如非人类有机体之间的跨物种交流。因此符号翻译学包含了两个类型：生物翻译（非语言符号过程）和语言翻译（人类语言参与其中）。既然语言之间的翻译只是所有翻译活动中的一小部分，就有必要扩大翻译研究的范围，超出语言内部和语言之间，并且对非符号表征的符号体系（单纯的图形或标记符号系统）中的翻译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科布斯·马瑞斯（Kobus Marais）和卡莱维·库尔（Kalevi Kull）认为符号意指需要一个变化的过程，实际上我们所思考的所有符号意指语言问题都能很好地证实符号意指过程所产生的无限衍义。符号翻译学这门学科的产生，其实是符号学家们为符号的意指过程的命名。如果翻译研究和生物符号学之间的对话能够成立，那这个共同点必然是符号。正如完全对等的翻译并不存在，当我们把翻译看成是符号意指过程本身，使翻译学和符号学两种体系相融的同时，也应该把两种体系之间的差别保留下来。^①

皮尔斯的逻辑符号学中三范畴的概念也启发了塔尔图学者继戈尔莱（Dinda L. Gorlé e）和特洛普（Peeter Torop）之后关注逻辑符号翻译学研究。塞尔吉奥·马丁内斯（Sergio Torres Martínez）认为尽管翻译是一种意识活动，且能被纳入更宽泛的解释过程来看待，但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翻译由第一性触发，是情感因素所驱使的符号转化。翻译过程更像是一种变形，是相互制约的符号系统跨越彼此的边界相互施加影响，而不仅仅是要在模式化的符号域中挣扎着生成意义。^②

与其他符号学家们的观念不同，塔尔图的学者们认为符号翻译学是一种有目的

① See Kobus Marais, Kalevi Kull, “Biosemio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Challenging ‘Translation’”, in Yves Gambier and Luc van Doorslaer, eds., *Border Crossings: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 Disciplin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Inc., 2016, pp.169-175.

② Sergio Torres Martínez, “Semiotic Translation: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dagogically-oriented Subtitling”, in *Sign Systems Studies*, 43 (2015), pp.105-109.

的、由社会因素驱使的活动。它强调除了具体的翻译媒介，我们传统观念中其他参与翻译活动的社会角色的进步也至关重要。在对符号的解释中，塔尔图学派认为不能忽略语境的作用，如果在解释文本时不考虑语境本身的模式和形成过程，就无法探讨文本所具有的双重特点，即文本本身所展现的意义和它指涉着的语境中的信息。对一部翻译作品的评判，必须在更为宽广的文化语境中才能获得意义。语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外部文化因素有时会导致语境的骤变，可能会从一个语境进入到另一个语境，翻译活动参与者是符号结构中的个体，他/她的身份一旦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时，其自我维系就会困难重重，便会向语境提出相应的要求。假如语境缺失了，文化符号和符号结构中的个体参与者（可被理解为作者、译者和读者）就会创造出适应他们自己的语境。文学翻译活动遵循这样的规律，在符号翻译的语境中，目标文化不再是某个被设计好了的翻译项目的接收者，因为译本的使用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翻译过程中。

符号翻译学赋予自身一个更为宽泛的理念，涉及每一个符号系统的转换，符号的转换发生在符号意指过程中，而翻译却不会。马丁内斯认为符号学的翻译观使我们对很多根深蒂固的翻译观念有了重新认识。比如雅各布森对于“语际翻译”“语内翻译”“符际翻译”的划分，“语际翻译”不仅仅是“重写”，在译本中，它包含了一系列非语言符号，它与符号力共存并且能极大地提升符号力，扩大翻译的范围；“语内翻译”是不同功能文本的产物，也包括了非语言符号系统；“符际翻译”既不是“改编”也不是“置换”，例如小说改编成电影。^①符际翻译显然引起了符号学家们更多的关注，戈尔莱在研究舞台剧语言时特别指出符号间性会产生语言——文化因子，使神话中典型的符号或象征主义以及互文性更加形象具体。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属于雅各布森眼中的“适度翻译”，而在一百五十年后，歌剧翻译需要“符际翻译”或“符际变化”来使译文更符合现代观众的口味。^②

此外，在符号学家们眼中，符号翻译学是可溯的，它的解释力来自对“第一性”的强调而非来自与符号对立的“第二性”所导致的解释（“第三性”）。所以符号翻译学不是关于“第三性”，仅仅是关于象征性或习惯性，译本被视为文本从深层结构到浅层结构到表征。翻译的目的被看成是在既定文化中决定翻译质量和功能价值的一系列评价体系。

① Sergio Torres Martí nez, “Semiotic Translation: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dagogically-oriented Subtitling”, p.108.

② Dinda L. Gorlé e, “Intersemioticity and Intertextuality: Picaresque and Romance in Opera”, in *Sign Systems Studies*, 44 (2016), p. 587.

塔尔图符号学翻译观也令我们不禁对其他译学问题进行思考：翻译似乎已经走下神坛，因为我们拿那些功力深厚的译者所从事的创造性艺术加工去和平淡无奇的符号转化过程比较，似乎有失偏颇。原先翻译被看成是独特的文学行为或是高深莫测的文学范式，甚至一些学者认为翻译是只能被智者掌握的文学艺术。而我们对于翻译类型的划分是否应该把符号意指过程的特征考虑在内？相比于一些空中楼阁的理论，翻译学和符号学的携手的确能在雅各布森、皮尔斯、洛特曼、西比奥克等人那里找到理论支撑。

前瞻：塔尔图学派在新世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塔尔图的学者们不单单是文艺理论家或语言学家，他们大都有理工科的背景，在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等领域都颇有建树，而塔尔图当地自由宽松、无拘无束的学术氛围使他们总能跳出现有理论的桎梏，敢于公然对抗达尔文主义，也敢于以一种全新独特的令世人为之震撼的眼光看待全球的变化。他们担忧过多的交流会致文化的同质化，但又深知异质文化之间相互融合和渗透是大势所趋，无法避免。于是许多塔尔图符号学家总是在理论研究开始阶段提出一个个悖论，然后试图去解决这些悖论，例如符号学家们通过建造模塑来认识世界，然而认识世界的方法本身却是不能简单划归的。

在塔尔图这个浸淫着源自苏俄文化的浪漫主义的学术圣地，结构主义的方法不仅仅是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普遍应用于其他学科，人类的起源问题被揭开面纱，人类创造的文学边界被打破，所有类型的符号过程都被纳入研究范围，从细胞到文化，从生命的起源到城市群体发展，塔尔图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无疑包罗万象。

以爱沙尼亚这个东欧小国为学术活动中心的符号学家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强调文化的地方性特征，他们在学术上另辟蹊径，探索符号学基本概念和生态自然的联系，运用实证的方法去研究语言和文化实践问题，力图避免学术上的形而上学。新塔尔图学派的研究重心仍然是与语言相关的问题，但也同样关注和尊重民族文化。他们秉承莫斯科塔尔图语言学派的优良传统，并对此有极高的自豪感。鉴于塔尔图学派受到苏联及东欧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特征的影响，一些学者身上或多或少体现了对霸权主义的反抗，就像有些塔尔图的学者不遗余力地比较发端于索绪尔的苏联符号学体系和发端于皮尔斯及莫里斯的逻辑符号学体系的优劣，并突出本学派理论更为合理的地方，比如拉斯在比较皮尔斯和洛特曼的对话理论时提及皮尔斯对“对话”的理解是解释性的，

有明显的缺陷，而洛特曼认为“对话”是概念性的，是符号学中最基本的意义生成机制。^①

笔者相信塔尔图学派在未来仍然会把洛特曼、乌斯宾斯基、乌克斯库尔等人的理论作为研究重点，尤其是洛特曼经过三十多年的理论构建，创立的文化符号学还遗留了许多有待探索的空间，如诗歌文本与小说文本的比较，原作文本与译本的语言语义研究等；其次，对于其他学科如符号翻译学亦或是翻译符号学的构建都意义深远，而翻译学与符号学之间普遍联系的认知也是未来符号学界对于“trans”（转换）主题不断探索的焦点。

可以说塔尔图学派的符号学理论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但是新兴学者们显然不满足于仅仅对前辈经典进行诠释，他们关心着新世纪意义究竟衍生到了何处、城市化对人类生存环境有什么影响，他们用科学的方法看待文学实践、文学演进以及文艺学问题，试图用“对话”的方式打通文学的“限制”，让文本在更大的“域”中无限衍义。而在我国，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已经与塔尔图学派的学者们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塔尔图的符号学在新世纪的推进也随着诸多高质量译文集的出版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所认知。鉴于塔尔图符号学研究内容的时代性、多元性和包容性，以及中国学界对于其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塔尔图学派在今后较长的时间里将依然是我国乃至国际学界研究的焦点和热点。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海大学文天学院
责任编辑：苏玲

^① Oliver Laas, “Dialogue in Peice, Lotman, and Bakhtin: A Comparative Study”, pp.542-561.